

Reader

培文读本丛书

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 斯皮瓦克读本

[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著 陈永国 赖立里 郭英剑 主编



From Deconstr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Globalization

A Spivak Read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rom Deconstr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Globalization

A Spivak Reader

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 斯皮瓦克读本

[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著 陈永国 赖立里 郭英剑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 斯皮瓦克读本 / (美) 斯皮瓦克著; 陈永国, 赖立里, 郭英剑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1

(培文读本丛书)

ISBN 978-7-301-12652-3

I. 从… II. ①斯… ②陈… ③赖… ④郭… III. 斯皮瓦克-殖民主义-文集 IV. B0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9945 号

书 名: 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 斯皮瓦克读本

著作责任者: [美]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著; 陈永国 赖立里 郭英剑 主编

丛书策划: 高秀芹 于海冰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652-3/G·216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7.5 印张 486 千字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中译本自序

中国读者对我的作品感兴趣，我深感荣幸。我自认为我是亚洲人，能让另一个亚洲国家的读者了解我的思想对我非常重要。五年前我就开始学习汉语了，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我的中文本，而现在，我只能以感激之情欢迎即将出版的中译本了。

我曾经非常幸运地访问过清华大学，实际上，我还是清华大学的名誉教授。因此我要再次对中译本的出版表示感谢。这个读本收入了我早年的一些文章，包括受到读者好评的最早作品，即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译者前言。我不是哲学家，甚至不是懂哲学的学者。在快到30岁时我写了这个前言，为了就能就德里达的著作说点什么而“开始学点”哲学的。德里达的著作令我兴奋不已。我第一次读《论文字学》时甚至不知道德里达是谁，便开始投入热忱的翻译工作。经过四年的翻译，我逐渐了解他了，这是我最大的荣幸，而与这位哲学家及其著作的相遇无疑改变了我的生活和思想。

这个读本还记录了我与南亚从事底层人研究的历史学家的合作。我仍然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尽管我与他们的关系很复杂。《底层人能说话吗？》一文有很多读本，也有很多读者，褒贬参半。实际上那是对印度教的批判，只是偶尔流露出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批判。我的基本想法是：虽然寡妇自焚的犯罪行为是一个未受质疑的善举，但由于改良没有或许根本不能够确立执行这一善举的妇女的主体性，[这里缺了点什么？]当一个年轻妇女抵制这一善举的各个前提时，甚至她自己家里的女人们都没有认识到这是抵制。在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是讨论关于妇女通过殖民主义开始阶级流动的。我认为阅读这篇文章的主要问题在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它是由一位都市少数族裔成员所写，但却出自一位属于印度民族大多数的成员之手。我很高兴通过这个读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读本中还有一篇早期阅读马克思的文章。我认为我对马克思的阅读要更早些。自1978年以来我一直想写关于社会主义伦理问题的书。当我慎重考虑如何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都发生了变化。此时，我认为《阅读马克思》(*Speculations on Reading Marx*)标志着我接触解构主义之后重读马克思的开端。

关于德里达论述马克思的著作，如果读者对我的反应感兴趣的话，那就读一读我登在《区别符号》(*Diacritics*)第25期上的《幽灵写作》(*Ghostwriting*)一文吧。

现在人们所说的全球化是我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社会批判的组成部分。本集中的其他文章都与这种特殊批判相关。这也是我们目睹的一个变化。现在我正在结束手头的一本书的手稿，叫《其他的亚洲》(*Other Asia*)。书中，我主要谈的是：(1) 从后殖民转向全球化批判的必要性；(2) 走向一种反族裔的批判区域主义，以便抵制当代全球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暴力，这种全球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了欧美貌似合理的“世界文学”的支持。

我再次诚挚地感谢我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希望这种兴趣能够继续下去，并希望在我下次来访时展开热烈的讨论。

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

2006年9月

(陈永国译)

Preface to Chinese Translation

I am deeply honored by the interest in my work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consider myself an Asian and the ability to share with another Asian country of such import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e. I have been learning Chinese now for about five years. I hope some day to be able to read the translations myself. As for now, I can only receive with gratitude the translations as they come ou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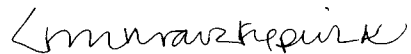
I had the great good fortune of visiting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at the moment, I am indeed a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faculty. From this stance of collegiality, let me acknowledge once again with gratitude this volume in translation. It includes some of my early work, indeed the earliest writing that earned anything like public acclaim, mainly, the translator's preface to Jacques Derrida's *De la grammatologie*. I am not a philosopher, not even a disciplinary student of philosophy. I was in my late twenties when I wrote the preface and had "put myself to school"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work of Derrida, which excited me greatly. I did not know his name when I read *De la grammatologi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began the arduous work of translation. It was my great good fortune to come to know him about four years into the work, and, that encounter, first with the work, and then with the philosopher, certainly changed my life and my thinking.

This translation also keeps a record of my time with the Subaltern Studies Collective of historians of South Asia. I still remain attached to the collective, although my relationship with them has been altogether complex.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 widely translated and widely read—both criticized and praised, was in fact a critique of Hinduism— and only incidentally a critique of British colonialism. My general point was that, although the criminalization of widow-burning was an unquestioned good, since the reform did not or perhaps could not engage with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women who performed the practice, [something missing?] when a young woman performed an act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presuppositions of the practice, even the women in her own family could not recognize this as an act of resistance. To an extent, this piece is also about the class mobility introduced among women through colonialism. I think the main problem with reading the piece was that hardly anyone recognized that it was not written by a member of a metropolitan minority, but rather by a member of a national majority in India. I am glad that this translation gives me the occasion to repeat this warning. There is an early piece on reading Marx. My encounter with Marx has proceeded somewhat further, I think.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writing on the question of socialist ethics since 1978. The world, including, of course, China, changes under my feet as I keep pondering how that book can ever be written. At this stage, I think “*Speculations on Reading Marx*” can mark the beginning point of a re-reading introduced by deconstruction. If the reader is interested in my reaction to Derrida’s own book on Marx, s/he will have to go to *Diacritics* #25 and read the essay titled “*Ghostwriting*”.

What is now called globalization was part of my social critique since the Eighties. The rest of the pieces in this collection all relate to that particular critique. This, too, is a *change we’ve seen* and I am at the moment engaged in finishing the manuscript of a book called *Other Asias* where I concentrate on, a) the need to move from postcolonialty to a critique of globalization; and b) toward an anti-ethnic critical regionalism in order to comba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violence of contemporary globalism as it is ideologically supported by specious interest in “world literature” to be found in the Euro-US.

Again, I am most grateful that my work is read in China. I hope this interest continues, and look forward to a rich discussion on my next visit.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September, 2006

编者序

从解构到翻译：斯皮瓦克的底层人研究

● 陈永国

在题为“知识生产的政治”的一次访谈中，^[1]斯皮瓦克认为翻译是不可避免的；所翻译的东西就是“语言的不可译性，习语的不可译性。”这是她就“文化翻译”的问题所做的两点解答。所谓“文化翻译”，指的是精神分析学家梅拉尼·克雷因(Melanie Klein)提出婴儿发明母语的观点。在访谈中，斯皮瓦克引用了自己的《作为文化的翻译》一文中的一段话：“梅拉尼·克雷因……提出，翻译的工作是一个不断的穿梭运动，也就是一个‘生命’。人类婴儿抓取某一物，然后抓取许多物。对一个无法区别于内部的一个外物的这种抓取构成了一个内部，在二者间往返，通过所抓取的物而把每一物编入一个符号系统。人们可以把这种原始的编码称作‘翻译’。”^[2]斯皮瓦克接着总结说，“读者……把翻译的不断的穿梭运动翻译成被阅读的东西，一定对再现的技巧和‘容许的叙述’——克雷因语——有了最亲密的了解，而这些正是一种文化的本质，读者也一定对事先假定的原文负有解释的责任。”^[3]

在斯皮瓦克以“拗口”、“难读”、“难懂”的卷帙浩繁的著述中，这段话算是比较清晰易解的了；同时也比较完整地概括了她迄今为止的理论著述的内核，体现了她对德里达解构思想的精确理解和继承，并在“解殖”实践中予以具体的应用。

首先，翻译的不可避免性和语言(习语)的不可译性正是德里达解构思想中蕴涵的一个深刻的悖论，也是德里达在自己的翻译理论中常常论及的一种“双重束缚”。在德里达看来，翻译是一种“转换”，^[4]既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转换，同时也是从能指到所指的一种转换。这后一种转换说的是翻译作为必不可少的语言活动，作为“哲学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思想传播和发展的必要工具或程序，必须先把词与意义分离开来，然后跨越意义进入另一种语言，进行重新组合或组装。但是，在德里达的解构系统中，词

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因素，没有确定的意义，在与其他词组合之前只是一个临时的因素，因此它本身没有什么具体的指涉或“超验所指”，不能随便抽出一个来任意使用。用德里达的术语说，词是一个“踪迹”，只有在与其他词的“踪迹”发生关联时才有意义，就是说，一个词及其意思与其他词及其意思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变幻不定、浮动嬉戏的能指链条，这是语言的内在机制，决定了意义的不可确定性，也决定了翻译的不可能性，因为“踪迹”的嬉戏使语言无法以确定的意义转换。然而，翻译是可能的，而且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又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踪迹”的嬉戏可以通过语用环境或“语境”得以固定下来。语境，不仅指一个句子中的句法和语法环境，而且包括规定语言用法的社会环境，是用来制约语言内部的嬉戏或“不确定性”的一个法宝，因此使传统的翻译成为可能。但语境只提供相对的稳定性，因为任何语境都不是完全封闭的，都具有潜在的“生成”能力，都不能不留下空隙，让他性介入进来，在同质的语境中置入异质的因素，或者说，在跨越意义的转换中构成一个差异系统，造成了一些意义的语境的位移。这就是说，从语言的角度看，一个文本要具有可读性，就必须具有可译性，但不必是全部的可译——文本的生存在于它最小限度的不可译性，在于隐藏在文本背后或之外的“意义”，也就是翻译通过语言的转换所要找到的东西。

其次，翻译是一种往返穿梭的运动，也就是“生命”的运动。译文是原文生命的延续，这一思想瓦尔特·本雅明早有明确详尽的阐述（《译者的任务》）。对德里达来说，翻译意味着文本具有一种普遍的可读性，把所指从能指那里分离出来的可能性，也是使文本获得继续生存的必然条件，因此，“拒绝翻译就是拒绝生命”（Derrida: “Living On: Border Lines”, 1979）。一方面，语言的生存取决于它的普遍应用，也即语言中个别因素得以不断重复的状况，而翻译是语言得以普遍生存或重复的一个必然条件。另一方面，在把翻译放在哲学传统内部来讨论时，德里达发现，虽然翻译代表了最基本意义上的语言应用，最生动地体现了语言之间“穿梭”往返的生命运动，但西方哲学史却普遍忽略了翻译的主题，而忽略了翻译的主题就等于忽略了语言本身，因为翻译的首要依据是语言，它所实践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因此，如果把语言问题看作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总体问题或“症状”，因而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的话，那么，“解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翻译的问题”（Derrida: Letter to a Japanese Friend），而“我从心底里佩服的那些男人们和女人们是唯一懂得如何书写的人——也就是翻译者”（Derrida: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2001）。

德里达对翻译的重视正如他的《论文字学》一样，对斯皮瓦克发生了决定性的影

响。如果说斯皮瓦克的理论和批评著述始于她翻译《论文字学》的工作，尤其是为其英译本撰写的前言，那么，她的女权（性）主义和解殖实践也就落实在了德里达所推崇的翻译上了。我们知道，德里达自己的理论生涯始于对胡塞尔《几何学起源》的翻译，他为其撰写的法译本前言“几何学的起源”据说在当时就超过了（胡塞尔）原文的深度。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也许将来也不可能在此类比的情况下给斯皮瓦克以如此高的赞誉，但她确实在应用德里达解构思想和方法的同时开辟了自己的领域。作为“后殖民批评家”（她后来否认这种称呼），她的兴趣就不仅仅是哲学，尤其是康德和马克思，而是整个西方思想传统（正如德里达的解构对象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或哲学传统一样），因为正是这个思想传统为欧洲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提供了话语基础和理由。于是，我们在《论文字学》的“译者前言”中看到了解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之间的最早联系。^[5]

然而，德里达在诸如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西方知识分子身上看到的西方思想的局限性，在斯皮瓦克那里变成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结构）的一种共谋关系：西方知识分子表面上为非西方主体说话，而实际上却剥夺了他们的话语权利，让他们沉默了。理论与权力的这种共谋关系恰恰是通过解构策略来证实的，因此是她从解构主义那里获得的“最了不起的礼物”，并反复把这个策略用于文学、历史、伦理和政治文本的解读上来，最为典型的的就是关于“底层人”的研究。^[6]

在斯皮瓦克看来，印度的民族独立并未给妇女带来解放，并未结束印度男性社会对妇女身心的压迫和剥削，她们仍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靠出卖劳动力和身体维持生存。这恰与“第三世界”的妇女的境遇是相同的。二者的可类比性在于：印度妇女的“解放话语”常常被淹没在男权社会的独立话语之中，这种话语以男性世界的真实解放掩盖了妇女仍然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实；而在与男权社会作斗争的女权主义运动中，西方女权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批评）自恃为“全球姐妹”的代言人，通过声称为全世界所有妇女说话而剥夺了“第三世界”妇女的话语权利，尤其是“亚洲、非洲和阿拉伯”妇女（Spivak, 1986: 226）。这从两个侧面说明了印度的独立解放话语和西方的女权主义话语与各自的主导社会结构达成了政治共谋。^[7]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价值。在最浅层次上说，要解构一个系统或理论首先要找出这个系统或理论的核心术语，阐明它赖以发生作用的等级制或二元对立，继而以解构主义的方法在结构上将其颠倒过来，通过与其反面的镜像形成对比而破解这个等级制或中心论。“言语”和“文字”的二元

对立是德里达早期解构的“语音中心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言语”是口头言说，最接近原始思想，言说时说者和听者都完全在场，而且是毫无阻隔的在场，因此是演说家的灵魂。文字是书面的，具有物质性，因此留下了踪迹，可以重复再重复，可以阐释再阐释。而最重要的是，在书面文字中，说话者总是不在场。如果说口头言说是精神活动的直接体现，那么，书面文字就是口头言说的符号，因此是二度派生于原始思想的。于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把书面文字附属于口头言说，建立了以语音为中心的等级制，被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因为它总是高扬在场，而忽视使在场得以在场的缺场。

德里达的解构分析有如下述：首先，他认为关于书面文字的一切分析都适合于口头言说。如果书面文字作为语音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那么口头言说作为“物的符号”也是符号的符号。如果书面文字是对口头言说的增补，那么口头言说就是对“真实世界”的增补。况且书面文字不仅仅是对口头言说的增补，而且是对它的替代，因为口头言说一落实在书面上，它就被文字替代了。因此，文字不但不应该隶属于言语，而且，二者间的等级还应该颠倒过来。这样一个解构过程不仅仅揭露了二元对立或中心论内部的不合理性，而且还揭露了被等级制所压制的东西，揭露了它进行压制的策略，这正是既定权威所担心和害怕的。然而，这只是解构工作的第一步：颠倒二元对立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颠覆西方的“在场形而上学”。

需要注意的是，德里达这里所说的文字是“普遍的书写”，不仅指印刷在纸页上的文字，而且指任何形式的文本，图像的，声音的，视觉的文本，以及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本，它们的意义取决于一个符号或语码系统。斯皮瓦克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底层人起义的历史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功能变化来研究的，这个符号系统就是被当作文本来分析的印度社会。在印度这个“社会文本”中，位于社会底层的底层人群体是根据权力阶级或社会主导阶级的语言和利益来描述的。这种描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英帝国的历史档案，在这些档案中，有关印度农民起义的记述服从于帝国的治理和社会控制；另一类是印度知识分子关于民族独立的历史叙事，或称作民族主义精英的历史叙事。在这些叙事中，局部的农民运动总是服从于民族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场的都是社会主流或中坚分子，而以农民起义为形式的真正的底层人斗争却成了缺场，且不必说得到承认和再现了。

于是，通过对这些“在场”的分析探讨和挖掘被“在场”所忽视的“缺场”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在20世纪80年代，一批印度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承

担了这一历史使命，人称“底层人研究小组”，主要成员有沙西德·阿明 (Shahid Amin, 1950—)，大卫·阿诺德 (David Arnold, 1946—)，帕塔·查特吉 (Partha Chatterjee, 1947—)，大卫·哈迪曼 (David Hardiman, 1947—)，拉纳吉·古哈 (Ranajit Guha, 1923—) 和加旻德拉·潘戴 (Gyanendra Pandey, 1950—)。他们试图在缺乏可靠的历史文献的情况下，重新发现印度下层社会或底层社会为印度的民族独立进行斗争的事例，并进行个案研究。这其实是在困境中寻找出路、在不可能性中寻找可能性的一种典型的德里达式研究，所遵循的方法就是通过批判殖民主义者对那段历史的再现来追溯底层人的政治斗争。理由是：如果在殖民地档案和民族主义精英记录的历史中看不到底层人的政治斗争，听不见底层人说话的声音，那就通过批判这两种主导的历史再现来重新铭写底层人的斗争，重新录制他们的声音。^[8] 斯皮瓦克认为这种做法十分接近解构主义的方法。

底层人研究小组的历史学家们的重要理论依据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斯皮瓦克对他们采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表示怀疑；她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阶级政治不适于描写复杂的底层人斗争的历史。在 19 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只发生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马克思论述的阶级斗争也只局限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但在印度，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中，在推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中，矛盾的双方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是大英帝国与印度民族，是印度社会内部的统治阶层和被剥削阶层，而参与这些伟大斗争的，就不仅仅有殖民地档案和民族主义精英在历史中记录的被殖民的中产阶级（民族斗争胜利后，他们变成了民族主体），而且还有即使在胜利后也仍然被剥夺话语权利的底层人，包括农民，妇女和部落的土著人。而所谓的底层人斗争也便由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扩展开来，把妇女运动、农民起义和少数族裔争取权利的斗争也包括进来，扩大了“底层人”的含义。因此，在方法论上，如果仅仅套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说，就会把不同底层人群体的不同的政治斗争、甚至其复杂的历史原因简单化了，就可能仅仅用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来取代殖民地档案和民族主义精英的历史叙事，从而使他们的解构阅读再次成为解构的对象。^[9]

针对这一解构悖论，斯皮瓦克提出不应该把底层人看作能够掌控自身命运的、握有政治主权的主体，这样的底层人主体只是民族主义精英编织的主导话语的产物，这种话语（或文本）错综复杂地与殖民地权力和知识结构纠缠在一起。换言之，底层人的政治意志是由主导话语建构起来的，并被置于资产阶级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之

中的。认识到这一点，就等于完成了解构阅读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把印度社会看作一个社会文本，一个阶级斗争的场所，一个连续的符号链，一个由无数踪迹构成的网络。而要深入探讨这个文本，读出隐藏在这个文本背后或之外的东西来，就必须首先颠覆这个社会文本，打破这个符号链，然后再将其重新链接起来。这无疑是解构的深层内涵，概言之就是德里达所说的踪迹系统，或“普遍书写”。(Derrida: *Of Grammatology*, 1974, 9)

在德里达看来，意识生活的可再现性取决于踪迹的可重复性，而踪迹所重复的无非是过去每一个瞬间的意识活动，是自我的一次无法简约的“折回”。那么，作为“普遍书写”的踪迹活动就可以利用技术把意义从局部的阐释语境中解放出来，通过重复或重新书写将其置入“异常的”语境，改变其语义或述行价值，而这正是一个语言符号在“正常的”或“严肃的”语境中所发挥的功能。但这种重复并不是重复某一相同的属性：纯粹对应的形式或意义的重复是没有的；一个符号的重复必须打破常规；每一次重复必须产生某种差异，产生某种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现代主体的独特性）取决于技术和实践。就好比一幅画的画框一样，它其实并不是固定的，是可以位移的，因此也是可以控制的。画框不是装饰物，它是作品的边界，而这个边界的确定取决于它的外部，它本身并不界定，界定是由观者来完成的。这就是说，画框无非是一种架构或建构，而架构或建构本身是脆弱的。德里达说，脆弱就是绘画的本质或真理，如果它有本质或真理的话 (Derrida: *Truth in Painting*, 1987, 73)。这无非是说，作为踪迹的普遍书写以其重复性允许对文本进行随意分配或重新嫁接，因为经验的性质和内容也是由重复、储存和架构的方式来决定的，可以通过再次引进而加以改变，这样的话，“不再以相同方式存档的东西也就不再以相同的方式存活了” (Derrida: *Archive Fever*, 1995, 18)。

斯皮瓦克对这种解构精神的领会是精到的；她对殖民地档案的考察和研究甚至先于德里达发表《档案热》(*Archive Fever*) 10年就开始了：即在1985年发表了《底层人能说话吗？》一文，标志着她自己的、不同于“底层人研究小组”的底层人研究的开始。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上述德里达的解构精神与斯皮瓦克的研究联系起来的话，不难看出，这种研究也是一种建构，一种叙事，一种踪迹的重复，只不过它的目的不是掩盖历史事实，不是发自统治阶级的主导声音，也不是使底层人沉默的霸权话语。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建构或架构“挖掘”历史事实，通过叙事重新发出被压抑的声音，通过踪迹让人们再次经验被忘却的“已然”经验，因为只有在一个构成性的建构

起来的“超语境”之内,并与一个超语境的“他者”相遇,才能清楚地说明这个“他者”。

这次,她选择了米歇尔·福柯和吉尔·德勒兹作为代言人:用以表明西方激进的知识分子何以在替底层人说话的同时又让他们沉默下来的。这样一种批判是以政治再现与审美再现的关系为依据的。在斯皮瓦克看来,艺术、文学、电影等审美再现的基础结构也是政治再现的基础,唯一的区别在于:审美再现通过再现真实世界突出了自身地位,而政治再现则不承认这个再现结构。换言之,政治再现与审美再现一样都是以“虚构”为基础的;艺术的“艺术性”,文学的“文学性”,都在于以这种“虚构”创造一种独特性,偶然性,机会或意外事件,正是这些才使思想成为可能。政治的“政治性”也必须依赖这种“虚构”来建构叙事或“宏大叙事”,并以这种叙事来否定自身的虚构性。作为代言人的福柯和德勒兹在为被剥夺权利者说话时仿佛戴着面具,以“缺场的非再现者”(缺场的作者)的身份说话,^[10]从而否定了他们自身建构的政治“叙事”,仿佛被剥夺权利者自己在说话,于是,他们的政治再现(历史叙事)就变成了审美再现(文学叙事)。

斯皮瓦克认为,福柯和德勒兹是把马克思所用“再现”的两层意思“合并”起来了:这就是作为审美肖像的再现(darstellen)和作为政治代理的再现(vertreten)。但这种合并是有等级的:审美再现被从属于政治再现;作为政治主体的被剥夺权利者(底层人)被从属于(据说是)为他们说话的政治代理者,于是,审美的肖像(虚构)便被当作他们的政治欲望和利益的表达。^[11]这无非是说,被剥夺权利者在福柯和德勒兹那里不过充当了作者表达自身欲望的替身,他们的修辞行为可能对被压迫者造成危害:底层人的反抗会因此被主导的政治再现过滤掉。这里蕴涵的意思是:(女性)底层人不是不能说话;她们可以说话,但她们的声音在主导的政治再现系统中被压抑了,听不到了。

附带说明的一点是:在福柯和德勒兹那里,“底层人”指的是工厂工人,囚徒,精神病患者。而在西方女权主义者勾勒的地图上,还包括他们为之代言的“第三世界”妇女。按此扩展开去,“底层人”的定义便把妇女的解放斗争和经验也包括进来,这样,其“下层社会”的内涵也被涂抹了,因为这里的妇女也包括中上层社会的妇女,她们中有很多人参与了妇女解放的运动,也和下层社会的妇女一样,在殖民地档案和底层人起义的历史记录中充当了“缺场”的角色,所以必须追溯她们的踪迹,归还她们一个物质的、文化的历史。于是,斯皮瓦克重新规定了后殖民知识分子的任务:从当下的物质和政治语境中“恢复”过去被剥夺的权利,重现过去被压抑的声音。

具体一点说，斯皮瓦克的底层人研究基本上以文学批评和翻译为主，她评论和翻译孟加拉作家马哈斯威塔·德维 (Mahasweta Devi) 的小说，为其撰写的序跋，以及关于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批评，乃至日常的文学教学活动，都是对这一任务的具体执行。在《想象的地图》的前言中，她说这是“有机知识分子”的任务。在一个脚注中，她说“有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身份概念，而是主体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焦点”。她进一步界定说，“当‘底层人’为了被听见而说话，进入了负责任（反应和被反应）的抵抗结构时，他或她就开始成为有机知识分子了。”马哈斯威塔就是这样一个有机知识分子。她描写了敢于打破一般知识分子的陈规旧俗的妇女，敢于在社会偏见的压力下结束自己生命的妇女，已经把社会的各种束缚内化了的底层妇女。马哈斯威塔以鲜明的形象呈现了整个印度地图上卖身为妓的女人身体，通过把已经内化了的性别差异当作独特的伦理选择而向全世界要求权利的妇女呈现了最难跨越的路障，进而提出：妇女应该奋起抵抗，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12] 而女权（性）主义译者的任务，如果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译者当作有机知识分子的话，则是要理解事物，理解自身（而理解自身就是生产认同），从而把语言当作性别代理机制的线索，通过书写代理而摆脱大英帝国的过去，摆脱种族主义的现在，摆脱“产于英国”的男权统治的历史。^[13]

这诚然是一项政治任务；完成的过程就是译者用语言建构意义的过程，就是以读者的身份进行亲密阅读的过程，就是从代理者的角度把语言织物边缘的破损减少到最小限度，而女性（主义）译者则要把“作为阅读的翻译”当成爱的交流。如此看来，如果把翻译看作是代理者在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穿梭运动中建构意义模式的话（如本文开头所示），那么他/她就必须首先谙熟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认清作为语言内在机制的逻辑性、修辞性和沉默：逻辑是代理者借以在语言之间进行词语转换（翻译）的指示原则；修辞可能对这种清楚的原则造成颠覆性破坏；而沉默则是在修辞中起主导作用的暴力。这正是代理者借以改造世界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他/她就能不仅以政治的方式，而且以伦理的方式，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归根结底以人的方式为另一种语言建构一个模式，否则就没有真正的翻译。^[14] 因此，翻译又是一项伦理任务。

作为政治和伦理任务的翻译是德里达论述翻译的两个重要命题。在德里达看来，翻译是政治的，因为翻译的可能性取决于语境，而语境并不是自然的，总是被强加了某种同质性，总是被赋予了某种爱憎分明的态度，总是要排除一些东西，同时加进一些东西的。翻译是伦理的，因为既然任何语境都不是完全封闭的（如前所述），就必

然留有空隙，必然有他者或他性介入进来；而且，既然一个语境是在翻译活动中向它所及范围之外的另一个语境的开放，于是便产生相互的责任问题，负债问题，和履行职责的问题。斯皮瓦克恰恰是为了这种政治性、这种伦理性开始从事翻译的。

在她看来，翻译的伦理性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最大限度的屈服，通过最缜密的阅读响应原文的特殊召唤，从而在翻译的过程中把他者变成像是自我的东西，这取决于友谊和爱欲。这种友谊和爱欲不但是她翻译马哈斯威塔的作品动因，而且还促使她试着写评论这位作家的文章，“仿佛对她的文本的细读使我们能够想象一个不可能的、未分化的世界，没有这样一个世界，任何文学都是不可能的。”^[15]然而，正如雪莉·西蒙所说，“斯皮瓦克力主翻译的不是民族的现实。相反，是马哈斯威塔·德维所追溯的‘错位的空间’，‘解殖’的空间”，并“试图把这个‘解殖’的空间引申到她的阅读上来。”^[16]在这个空间里，“德维以缜密的知识、愤怒和充满爱心的绝望展示了后殖民国家的机制。那里有受压抑的持不同政见的激进派，有争取选民的国家政府，有隐藏在善恶之下的官僚制度，有作为底层人的国家公务员。……站在对立面的是一小部分有良心的、有同情心的政府工作者……核心人物是一个记者。……一个置身种姓制度内部的印度教徒……一个边远的局外人，他在一个修辞空间里赢得了帮助埋葬以前的一种文明的权利。”^[17]

毋宁说，作为政治的和伦理的译者，语言并不是一切，不能仅仅把翻译看作是同义词的转换，词语的换置或意义的传输，而要利用语言的修辞性和沉默。它包含着可能的任意性，偶然性，意义的播撒，语言的分解，以及符号的不规整性。只有注重并合理地挪用这种修辞性，将其置于适当的位置，适当的环境，才能不丢失原文的文学性、文本性和感性，才能在原文的平台上进行甄别和选择，才能利用不同语言的不同修辞策略追溯一种共性，从而进入差异和变异的领域，达到超越和扩展的翻译，建立一种后殖民阅读（翻译）的政治学。斯皮瓦克选择了作为活动家、作家和记者的马哈斯威塔，通过一种“爱欲”的伦理特性，在被嵌入了无法逃避的责任结构的同时目睹了一场“增补”的集体斗争，懂得了文学写作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那就是通过“增补”把底层人沉默的天才再现出来，使之“作为理性存在以天赋的观点完成天赋的使命，即增补或完成世界的显现。……（因为）如果有必要增补或完成的话，那是因为缺失。没有人，上帝的神示就不会完成。人恰恰是通过活动来发展上帝的总体神示中所缺乏的东西的。”^[18]人要自己去完成历史的书写。

然而，历史的“书写”总是讽刺性的。当马哈斯威塔和斯皮瓦克所批判的那种

文明还未被彻底埋葬的时候，一种新的文明业已登峰造极了。世界已经从“东—西”转变为“南—北”的划分；标志着冷战时期特点的意识形态决战已经转化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经济决战；马哈斯威塔·德维的“想象的地图”也已迅速变成了由世界银行绘制的既真实又虚幻的地图。在这种情况下，斯皮瓦克似乎已经把对底层人研究的关怀扩展到对经济边界的关怀，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关怀，以及对非欧洲中心的生态正义的关怀上了。她所翻译的马哈斯威塔的故事就开始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银行了。

当印度步入 21 世纪时，一批新生代的知识分子结束了 20 世纪末的观望，开始关注一种新的畸形发展：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首的大国际金融财团一方面积极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原殖民地的中产阶级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使下层社会重新沦入了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境地。针对这一情况，一些印度知识分子或旅外印度作家开始关注当代文化生产中的政治现实问题，包括政治对生态景观的破坏，性别身份和种族身份的确立，民族形式的演变，跨国联盟的建立及其功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向全球经济的投降，以及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制下测绘新的焦虑和欲望从而实现民族认同等问题。于是，一种新的“世界银行文学”应运而生。

“世界银行文学”(World Bank Literature) 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世界文学”的自由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向“世界银行文学”激进的政治范式的转变，而且，作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一个变体，它更多地关注经济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日常生活状况等问题。因此，斯皮瓦克的“底层人”范畴势必再次扩展，把印度“西渐”的赛博工人(新技术工人)、“旅行”的新移民以及 1989 年以来反筑坝运动中的部落人(tribal people) 包括进来。这意味着关于全球化的一个新的尚未讲过的故事正在发生，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抵抗和新的主体性正在出现。全球化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事实，如果不能回归民族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那就必须努力实现一个不同的全球化。有鉴于此，文学叙事就必须讲述新的故事，缔结新的关系，描写和阐述新的抵抗和新的主体性。这是哈特和奈格里为“民众”规定的任务，或许也会成为斯皮瓦克为底层人研究规定的新任务。